

時報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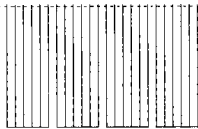
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上海繁華

Shanghai
Splendor

十九世紀上海中產階層的誕生，不僅打造了一座繁華城市，更使經濟改變了一個國家的發展。這是一個魅力的城市，也是卑鄙的城市。

葉文心



廣告回郵
北區郵政管理局登
記證北台字2218號
免貼郵票

時報出版

地址：台北市10803和平西路三段240號4F
 電話：(0800) 231-705 (讀者免費服務專線)
 (02) 2306-6842·2304-7103 (讀者服務中心)
 郵撥：19344724時報出版公司

請寄回這張服務卡 (免貼郵票) 您可以——

- 隨時收到最新消息。
- 參加專為您設計的各项回饋優惠活動。

請上facebook或plurk搜尋【知識大國民】

<http://www.facebook.com/pages/zhi-shi-da-guo-min/373734628394>

臉書

http://www.plurk.com/citizen_K

噗浪

時報出版人文科學線的噗浪跟臉書：

葉文心
著

上海
繁華

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



Shanghai
Splendor

獻給Irvin和Jim

目次

繁體中文版序 —— 007

導論 —— 011

第一章 唯物觀點的興起 —— 019

第二章 市井與廟堂 —— 049

第三章 都會符號 —— 077

第四章 時間和企業 —— 115

第五章 大家長與小家庭 —— 149

第六章 小市民的故事 —— 191

第七章 從父權到金權 —— 219

結語：再現風華 —— 289

致謝 —— 307

參考書目 —— 310
—— 339

《上海繁華》繁體中文版序

這本小書是一個學術性的著述。英文原著的讀者對象是作者的學術界同行。這本書描述的是上海，但是引申討論的則是幾個有關近代中國的大問題。北美學界有不少大家共同閱讀的著作以及議題，這些議論構成了本書的背景。這個背景對於中文本的讀者們來說，未必一目了然。現在中譯本版在即，我願意假這個機會稍作說明，以便利大家。

我們知道，上海是近代中國第一大會，上海的經濟有賴中西通商，上海的近代城市發展以鴉片戰爭之後的南京條約做爲起點。許多西方著述把上海的開埠看作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上海租界的成立，代表了廣州行商制度的終結，傳統朝貢體系的解體。西潮登陸中國，歐西主導的近代國際秩序在東亞興起。上海是西方打開中國大門的「鑰匙」。

這段門戶大開的百年歷史，今天大陸稱之爲中國的「被動開放」。這本小書並不反對以上的看

法。但是它同時注意到，開放本身並不意味繁榮。上海開放通商，位置靠北，在五口之中原本地位並不領先。但是一旦太平天國爆發，華南及華中全面捲進戰亂，情勢就產生了大的變化。長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諸如漢口、南京、蘇州、揚州、杭州全都落在太平軍手裡。廣州及內地其他地區則有各種會黨活動，中國內地的金融商貿交通功能無法繼續如昔運作，上海租界此時不但吸收了淪陷區的業務，躍升為沿海第一通商大埠，而且成為內地資產的避難場所。上海成為全國第一商埠，與其說全靠自身的發展，不如說得利於中國內地的戰亂與殘破。近代上海在二十世紀上半獨領風騷，不只因為西方帶來了現代文明，同時更因為近代中國「內憂」不斷。

上海是資本密集的城市，也是移民密集的城市。上海是近代中國經濟發展最為快速的都會，也是九流三教、五花八門，成群結社，競爭激烈的複雜場域。上海是全國新聞、教育、出版事業的中心，也是罷工、罷市、工運、幫派的中心。中國共產黨發源在上海，中國的其他民主黨派更是在上海發揚光大。上海是抗日民族主義愛國活動的大本營，也是漢奸聚集、中外利害相結的大本營。總之，十里洋場花花世界表象的背後，不啻是近代中國轉型中的種種張力與矛盾。

二十世紀中期大陸學界從共產黨革命的角度描寫近代上海，著重描述其中資產家與勞動人民的階級對立，以及國民政府統治階層的賣國與腐敗。這樣的上海，就像矛盾的小說《子夜》所描寫的，資產階層道德墮落，物慾薰心，煙、賭、娼公然成為大生意，經營這些行業的「聞人」杜月笙不但飛黃騰達，而且位列名流，進入銀行、大學的董事會與各種慈善、愛國組織。總之，這種上海缺乏道德上的合法性。這樣的繁華是把貌似進步文明的高樓大廈建築在十八層地獄上。上海因此是中國的恥辱，也是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革命必須以鄉村加以包圍、加以改造的對象。

許多中英文文的上海社會史，寫的是海上聞人名流的傳奇，或者是工人、左派的運動史。最終所解釋的，不外是國民政府的覆敗，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我的這本小書，所關切的問題並不出這個左右對立的社會文化範圍，但是這本書聚焦的對象，卻是在上海工商業背景下，中層社會一般小市民每日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種種經歷。二十世紀上半，在現代化的都市範圍裡，上海人心目中有一套生活憧憬，也有一套經濟倫理。這本書認為這兩股思維在大時代之中交叉運作，兩者之間的落差，構成了政治抉擇的背景。上海小市民的悲歡，可以提供醞釀社會民主思潮的土壤，然而小人物們在大時代、大資本、大組織之中，即使有所覺悟，如果想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也難免身不由己。

總之，這本小書中的主人公既不是有頭有臉的上層大人物，也不是窮而無告的底層分子。這本書所著墨的是一個大城市與其中無數小老百姓的平常故事。小市民的辛勤造就了上海的繁華。他們的怨懟也轉換了這個大城市以及近代中國的命運。上海繁華是平常人的城市史。這部城市史改寫了近代中國無數平常人的命運。

導論

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四二）之後，百年之內，上海崛起，成爲東亞第一大都會。活躍在上海的是一個內涵豐富的中產市民階層，他們興起，成爲中國社會現代發展的重要成員。

傳統中國是賤商的。而這個新興市民階層，卻又是以商爲業的。上海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但在於上海的工商發達，更在於上海的新商人在都市轉型的背景之下，取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上海的新商人多數高度西化。他們也活躍在外國租界。但是他們卻能成功地把新式工商建構成近代中國富強的支柱。傳統中國有「無商不奸」的說法。而在上海，新商人雖然透過市場追求財富，但是大家相信這並不算是個人的圖利行爲，而是爲了追求國家的富裕。新商人雖然累積個人資產，然而大家也相信他們所用的手段並不是欺騙與貪婪，而是透過專業知識與企業組織，以科學方法創造新財富。上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功地建構了這個近代新富階層，把他們塑造成一股愛國、專業與自治

的力量。

這個都會新商論述，為當時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圖景。透過學校與出版物，上海新興企業對當時年輕人傳遞了一個訊息，就是一個人只要學有所長，不斷努力求新向上，就可以在都會新經濟之中贏得一席之地，賺得一份資產，建立一個幸福的小家庭。上海的都市新型企業會給年輕人提供無數自我實現的機會。上海的繁華是每個有為青年所可以擁有的世界。

然而不幸的是正當這個近代中國資產階層都市論述在上海植根成長之際，全球經濟發生了大不景氣，股市崩潰，工廠倒閉，上海的新興工商也被捲進這個漩渦。剛剛成形的中產階層論述，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對廣大的職工來說，許多人即使勤懇懇，努力工作，拚命向上，也難以保住一份職業。三〇年代上海的白領階層失業率大增，一向靠自己的工作收入養家立業的職業者發現自己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卹兒女，在茫茫職場之中無依無靠，不知何去何從。這種危機感，深切地動搖了資產階層都市論述的說服力。

三〇年代中期，一股左翼思潮在上海崛起，把都市資產階層個人與家庭的出路跟國家民族的出路結合起來論述。根據這個說法，市民階層的悲劇，並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國家命運在帝國主義體系之下的寫照。上海的中國民族資本逃不出西方殖民主義經濟勢力的籠罩，也逃不出帝國主義一貫的侵略與剝削。都市的市民階層如果想要為自己及家人找到生機，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社會主義的陣營，以國為家，以集體結合的力量與剝削者做正面的戰鬥。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的許多新型企業跟隨國民政府，搬遷到抗日後方去。沒有搬遷的產業在上海淪陷之後不得不逐漸跟敵人妥協，否則就存活不下去。上海工商企業的名人領袖們於是在愛國這

個題目上，比起民國初年，失去了他們的發言立場。相對於企業員工，這些領導人不久也就被看成純粹的資本家，減弱了社會道德合法性。四〇年代上海的職業界左翼地下黨十分活躍。透過這些人的組織活動，一九四九年上海雖然政權轉移，但是工商企業的運作沒有中斷。許多「民族資本」平順地歸附了共產黨。

以上種種，大致歸納了本書所要講述的近代上海與中國的故事。在正文開始之前，還有幾點需要稍加著墨。

有關近代上海的工商，學者們已經進行過不少研究。跟那些作品比較，本書所著重的不是經濟史，而是以經濟活動為對象的文化史。我們所關注的不是上海的工商企業如何進行新式的經營，而是新式工商企業的從業者如何取得社會地位、如何為新型產業建構經濟倫理。

本書的前兩章徵引了不少材料，主要想審視的是這樣的問題：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究竟是怎麼樣建構他們的聲望？他們在租界裡活動，究竟在國家意識與經濟利益之間做了些什麼樣的表述？他們運用了些什麼樣的資源與方式來達成建構？結果算是成功了嗎？他們的成功與否，到底為什麼重要？

本書認為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透過教育與出版，曾經相當成功地為中國的資產階層建立了一套論述與倫理。在這套成功的機制裡，企業的經理人相對於自己的職工不止是老闆，同時還是專業上的老師。這就像傳統科舉制度，大官於小官，不止是上司下屬，更是座師與門生。因為是老師，所以經理對下屬的制約，除了專業表現上的要求，還包括倫理上的規範，在人事行政上考核職工的勤惰以及人品，做為考核獎罰的根據。到了四〇年代，這套論述因為種種原因，失去戰前的說服力。經理在職

員的眼中變成了資本家，小職員們熱衷於組織自己的職工聯合會，企業內部的上下關係變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而不再是師長跟子弟的企業大家庭。三〇年代的時候，都市建構中的企業總經理是家長，不僅在組織上地位高，而且在專業上知識高。到了四〇年代的後期，這些企業經理主管就被敘述成資本家。資本家自然也有好的，但是原則上必然是剝削的。相對於從前，大家長自然可以無能，但是在原則上必然是才德具備的。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來二十世紀的上海，在都會資產階層論述上曾經有過巨大轉變。

近年有關上海的著述已經出版了不少。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描述之中顯然不是個陌生的地方。但是這些作品，多半只把上海做為各種事件發生之地，上海只是個地名，沒有特殊的內涵。本書描述上海，則把上海的物質建設考慮在內。電車、電燈、收音機、電影、照相機、印刷機等事物在上海是習以為常的。這些東西的使用，無疑把上海建構成一種新的空間，改變了人們在其中交互往來的機會與方式。關於物質文明與近代中國的形成，有許多可以大作文章的題目。本書所關注到的不過其中之一二。

我們知道，上海外灘的江海關大樓，當時就裝點著東亞最大的時鐘。鐘在上海的辦公樓層裡是個重要的東西。有了鐘，企業裡才有法子講究紀律與效率，對員工們才能產生量化的制約。有了時鐘，火車、電車、輪船才能按時運作，才有準時與否的觀念，從而產生大批人大型活動的可能性。

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力的供應並不是無遠弗屆的。電車也只是租界的現象。太陽下山以後，南市常常漆黑一片，租界卻燈火通明。南市一切停擺，租界卻仍然人來人往，把夜晚當作白天的延續。租界的學校晚上可以開辦讀書會、俱樂部，南市的學校到天黑就活動有限。這樣的種種，是物質文化與

城市活動相互關聯的另一個例子。一個年輕人住在租界附近，晚上就可以有各種活動。都市的電燈與電車，豈止加倍了年輕人的社會空間。上海的許多職業青年於是白天工作，晚上透過夜校、讀書會、社團組織而相互交往。這種自發的社會連結，在上海可以發揮地淋漓盡致，而在別的城市之中卻因為物質條件的限制而不能做同樣的發揮。都市的物質文明對都市的社會文化動力不無影響。上海做為一個城市，在社會動員上的能量遠超過許多其他城市。這也是本書所專注突出的一個面向。

上海到底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中常有爭論。本書並不認為這個問題有什麼重要，因為無論上海的國籍是什麼，一個城市總免不了兼容各種異質文化。

相形之下，上海是否只是上海史上的上海？還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上海？本書認為這個問題可能更重要。對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人而言，上海經驗並不一定非在上海才能體驗。上海的傳媒、印刷和出版事業，源源不絕地把都市的訊息輻射向中國內地。對置身中國內地的人們來說，上海的都會絢爛，也許是離得越遠越具有特殊的魅力。

本書將上海的興起放在中國海洋史的脈絡之中來看。我們知道，上海是海通之後才興起的城市。但是中國的航海史用不著等到十九世紀西洋力量東侵之後才開始。早在唐宋之際，阿拉伯商人就到了泉州。明清之際，西洋傳教士與商人也就到了澳門與臺灣。

但是在英國人在上海開埠之前，這些海上活動都叫作「海上貿易」。只有在十九世紀上海開埠以及英國開館之後，海上的商貿活動才變成「國際貿易」。南京條約之後，海洋商事牽涉到條約、領事、法規與權益。在歐式國際觀的主導之下，商民錙銖計較的「細務」可以變成為廟堂議論和戰的大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大可說中國的海上貿易史並不是十九世紀的產物。但是上海的興起，卻無